

以文化礼堂治理乡村文化的路径探析

——基于浙江省金华市文化礼堂的调查研究

夏晴 李婉儒 刘林峰 任佳怡¹

(浙江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0)

【摘要】: 文化礼堂建设是推进乡村基层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措施, 是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 是丰富村民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 具有治理乡村文化的重要意义。在理论层面, 文化礼堂“治理文化”具有必然性、“用文化治理”具有可行性, “治理文化”与“用文化治理”具有密不可分、共同发展的互动关系。在应用层面, 文化礼堂对公共文化、地方特色文化、乡风文明等内容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究其实现路径, 可以从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经济产业开发经营, 乡村文化特色风貌、文化供给内容途径, 村民凝聚力归属感、乡村良好风气氛围, 乡村文化宣传平台、村民自豪感积极性等方面进行思考。

【关键词】: 乡村文化治理 文化礼堂 路径探析

【中图分类号】 G249.27 **【文献标识码】** A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化“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 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黏合剂’。”乡村文化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浸润甚至是杠杆性作用, 探索乡村文化治理的作用机理与实现机制, 已成为理解与推动“五大振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作为全国乡村振兴的标杆省份, 2003年浙江省开启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为主题的美丽乡村建设。2013年, 该省委省政府启动文化礼堂建设, 并连续多年将其纳入十件为民办实事项目, 着力将文化之魂深入于美丽乡村建设行动,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鲜活的浙江智慧与浙江方案。其中, 金华市文化礼堂自建设以来取得显著成效。因此, 在新农村建设全面提升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 以浙江省金华市文化礼堂建设管窥乡村文化治理的推进机制与实际绩效, 有助于明晰乡村文化治理的发生机理、探究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机制, 总结并提炼可复制的发展经验。

1 文化礼堂治理乡村文化的机理分析

文化礼堂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也构建了乡村文化转型发展的新模式。要想分析其治理乡村文化的机理, 可从文化礼堂“治理文化”与“用文化治理”的发生、互动机制着手。

作者简介: 夏晴 (1999-), 女, 浙江金华人, 本科在读;

李婉儒 (2000-), 女, 河北石家庄人, 本科在读;

刘林峰 (1998-), 男, 浙江温州人, 本科在读;

任佳怡 (1998-), 女, 浙江舟山人, 本科在读。

基金项目: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乡村文化治理如何可能? ——基于浙江文化礼堂的调查分析”(编号: 201910345006)

1.1 “治理文化”与“用文化治理”的发生机制

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也孕育着现代的文明，是最稳定深层的、灵魂性的内容。然而，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加快，乡村文化受到较大冲击。乡村文化精髓无法得到继承弘扬，家风、民风和乡风建设出现问题，乡村文化生活变得匮乏，乡村文化产业不能有效发展。面对这一现状，有乡土情感的村民希望有所改进，使乡村文化的建设更符合自己物质、精神层面的美好生活需要。由此，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文化治理提供有力支持。其中，文化礼堂成为重要载体。基于乡村文化的式微、村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乡村的振兴战略，文化礼堂“治理文化”的发生具有必然性。

文化礼堂是乡村文化治理与振兴的重要平台，具有丰富的文化基因。首先，文化礼堂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因，可以培育和塑造主流价值观，凝聚价值共识；其次，文化礼堂具有公共文化的基因，可以提供村民间交流合作的平台，构建公共文化活动场所，使各年龄段的不同群体都能获得活动内容和空间。最后，文化礼堂具有特色文化的基因，村史沿革、文化古迹、特色民俗等可被展示，并融入到文化活动。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公共文化、特色文化，文化礼堂“用文化治理”的发生具有可行性。

1.2 “治理文化”与“用文化治理”的互动机制

“治理文化”指的是乡村文化的建设和供给，“用文化治理”是治理过程中对文化基因的运用，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工具。“治理文化”与“用文化治理”之间有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第一，“治理文化”离不开文化的内核，治理文化过程中的物质建设固然重要，但运用文化基因进行治理才是使文化得到治理的关键所在，治理文化必然“用文化治理”，以文化为重要工具。第二，“治理文化”使被治理文化的文化基因得到恢复发展，使文化作为治理工具得到提升、“用文化治理”的强度得以增加，进而使“治理文化”的效果得到增强。第三，“治理文化”与“用文化治理”之间是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最终会使文化不论作为治理对象还是作为治理工具，都能得到不断的前进发展。

2 文化礼堂治理乡村文化的效应分析——基于浙江省金华市文化礼堂的调查研究

金华市的五星级文化礼堂数量在“2019 年度浙江省五星级农村文化礼堂”中位列第二，文化礼堂建设具有显著成果，以其为例对文化礼堂治理乡村文化的效应进行分析大有裨益。

2.1 建设公共文化，构建新时代精神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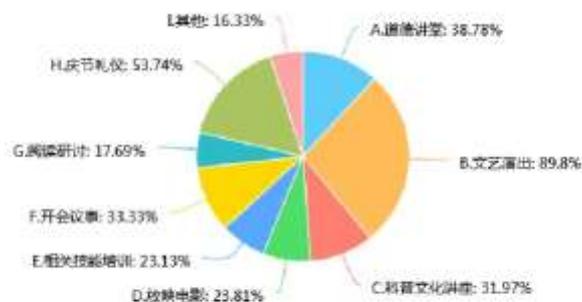


图 1 文化礼堂举办过哪些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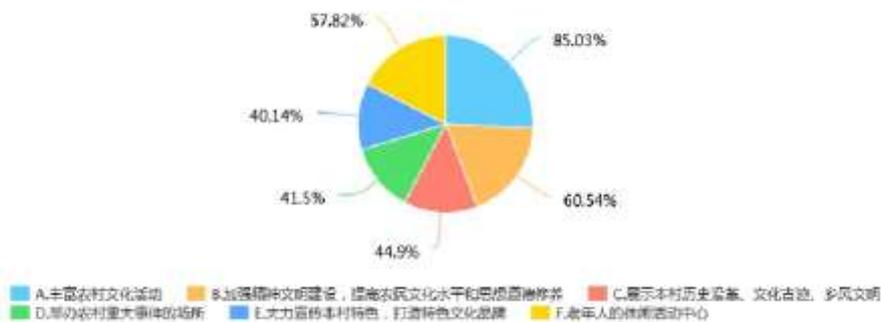


图2 您认为文化礼堂建设起到了哪些作用

文化礼堂不是单纯的文化活动场所，其定位在于成为“农民群众的精神家园”，在保证“五有三型——有场所、有展示、有活动、有队伍、有机制和学教型、礼仪型、娱乐型”的前提下，充分发掘乡土文化和现代文明，农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丰富起来。如图1所示，85%的村民认为文化礼堂丰富了农村的文化活动。一方面，在村干部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文化礼堂发展了丰富多彩的文体组织与文化作品。例如叶店村，不仅以结合流行元素的形式挖掘乡村文化，发展了军鼓班、戏曲班、模特班等多家文体组织，创作了《亲爱的婺城，亲爱的你》等优秀文化作品。另一方面，政府主动“送文化下乡”，带去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与切实有用的文化知识。

概括而言，文化礼堂保证了农村的文化供给所必须的硬件设施、规范的制度，推动了文化活动的常态化。另一方面，它通过送文化、种文化，丰富了农村的文化供给。

“文化礼堂，精神家园”。从唱歌跳舞、观看表演的文娱活动，到涵养民间生活规范的礼仪活动，逐渐向更高层次的构建基层社会公序良俗、充实丰富村民精神世界、构建生活共同体推进。这些文化活动体现了村民们日常生活养成的理念和路径，积淀着他们共的文化认同、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2.2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地方特色文化记忆

文化礼堂在建设之初，就强调突出地方特色，强化精品意识，“一堂一品”，将地方特色文化保留下来。各村充分利用“两堂八廊”，展示村史村情、乡风民俗，挖掘优秀的家风、先贤故事等，将“乡村记忆”保存下来（图2）。例如，湖头村建立的文化馆，将当地的婚丧嫁娶习俗以“老物件”的形式留存起来；含香村将老艺术家组织起来，成立了道情班，使更多年轻人了解道情这项民间艺术。在此基础上，文化礼堂鼓励、带动村民发挥自己的文化专长，培育具有地方代表性的优秀文化作品，到各地演出、参赛。例如，含香村的《奇石下吴》曾在省人民大会堂演出；叶店村创作的《金华有座白龙桥》曾多次登上省、市舞台并大受好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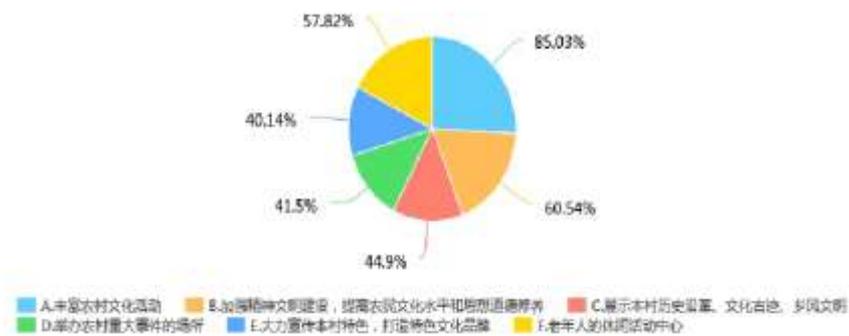


图3 您认为文化礼堂起到了哪些作用

文化礼堂不仅让村民成为文化活动的角色，还使乡土文化有效地保留下来，在继承中得到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文化礼堂赋予了村民归属感和满足感，村民在切身体验过程中提升了自豪感，增强了文化自信。

2.3 振兴乡风文明，促进“三治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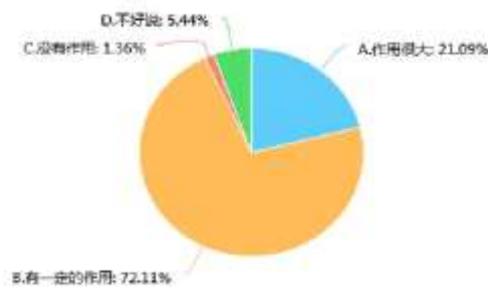


图4 文化礼堂的敬老墙与相关活动对改善老人的生活的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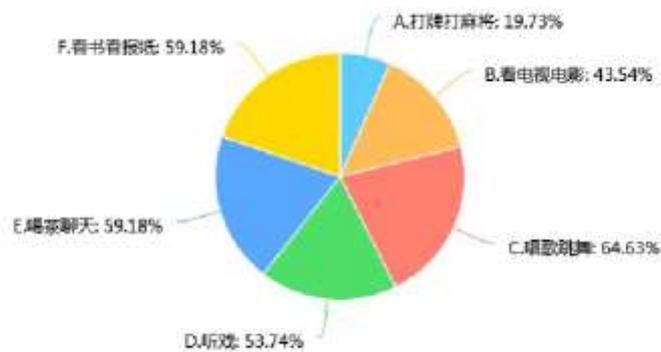


图5 您参与最多的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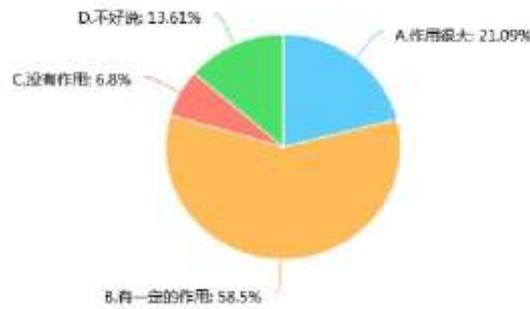


图 6 文化礼堂对减少不文明现象有没有发挥作用

许多乡村依托文化礼堂，弘扬孝悌文化、乡贤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好人榜”“寿星榜”“笑脸榜”，开展“好媳妇”“好婆婆”等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及道德讲堂宣讲活动。21%的村民认为文化礼堂对改善老人的生活作用很大，72%的村民认为有一定的作用。文化礼堂用庄严的仪式、喜闻乐见的活动，把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弘扬起来，以文化人，提升村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培育尊老爱幼、睦邻友好、团结友爱的文明乡风。此外，文化礼堂还设置了多元化的娱乐场所引导村民正确娱乐。除了节日庆典等大型文体活动，文化礼堂还设置了日常娱乐消遣活动，供村民娱乐消遣。下骆宅村设置了健身房、棋牌室、影音室等。这些活动场所的建设，大大减少了聚众赌博、八卦、打架斗殴等现象（图 3、图 4）。此外，文化礼堂开展了以党的理论和形势政策、科学知识、法律常识等为主题的各类宣讲活动，加强对农民群众思想引领的高度，抵制封建迷信活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抵制腐朽文化，剔除落后文化。

概括而言，文化礼堂有效利用了乡村历史中德治、礼治、教化等熟人治理方式中的积极因素，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以自治增活力，助力乡村治理。

3 结论与讨论

文化礼堂的建设源于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背景下乡村文化的式微，其建设目的在于使乡村文化得到有效治理、实现乡村的振兴发展。对于其治理乡村文化的路径，可从四个方面进行思考。

3.1 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关注经济产业开发经营

文化礼堂治理乡村文化的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是最基础的物质与制度保障，是文化礼堂发挥作用必须要依靠的部分，并随着文化礼堂功能的丰富而被要求升级。

其中，基础设施建设与资金密切相关。调研时，许多文化礼堂将基础设施得不到修整更新归因于资金不足，并诉诸政府更多的补贴。但事实上，政府的补贴只能暂时解决问题，要想将其根本解决，乡村还是应当借助经济政策的支持，依托礼堂因地制宜地进行经济产业的开发经营。例如，下张家村借文化礼堂打开当地茶花知名度，既巩固了茶花产业，也发展了旅游业，其基础设施也不断得到更新建设。而文化礼堂的管理则不主要与资金有关。含香村村民表示“文化礼堂太‘小’”，下骆宅的文化礼堂管理员反映“后备军力量不足”。面对这些文化礼堂管理的问题，制度化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帮助。只有文化礼堂的具体使用、人员配置、管理机构等都得到规范，其治理文化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

3.2 重塑乡村文化特色风貌，丰富文化供给内容途径

有了物质与制度保障，如何进行文化供给是一个重大课题，它包含政府的主动供给与村民的自主创造。其中，政府的文化供给主要包括技能培训、文化讲座等能提升村民科学文化素养的活动。但调研中发现，这些活动未能吸引所有村民的兴趣。对此，下骆宅村干部认为要“丰富活动内容形式，吸引年轻人参与”，文化礼堂管理员认为“外地人的参与”也应被考虑。由此，政府的文化供给内容要增大覆盖面，尤其要促进年轻人、外地人的融入。

除了政府的主动供给，村民的自主创造也应被重视。在村委与普通村民的组织下，许多乡村拥有了自己的文体组织。并且各村积极将时代特征融入传统乡村特色文化，重新塑造出了新的乡村特色文化。例如，含香村不仅借助文体组织弘扬金华道情，也将垃圾分类、美丽庭院建设等融入其中，使金华道情这一特色文化既得到继承，又不与时代脱轨。而在村民的自主创造中，专业人士的指导至关重要。含香村有“获得过省级金奖、银奖的业余的书法家、画家”进行指导，叶店村则缺乏专业老师指导特色剧种。因此，政府可鼓励专业人员投身农村文化建设或对特定村民进行培养，从而实现乡村自主供给、创造文化。此外，乡村间也可进行文化交流，以此拓宽供给途径、满足村民精神文化需求、营造乡村之间的良好氛围。

3.3 增强村民凝聚力归属感，营造乡村良好风气氛围

以文化活动供给为契机，村民的交流增多、凝聚力增强。其中，婆媳矛盾、邻里矛盾变少了，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也更加亲近。并且，文化礼堂所重塑的乡村特色文化以传统为根基，使村民的归属感更强了。可见，文化礼堂的建设推动了村民关系的和谐。但调研发现，乡村除了要协调本村人内部的关系，还要协调本村人与外来居住者的关系。对此，湖头村文化礼堂管理员表示村内“外地人很少参加文化活动，较难管理”。而下骆宅则通过“组织外来人员志愿者队伍”来推动外来居住者的融入。由此，策划发挥外来居住者价值、促进其与本村人交流的活动十分必要。

在整体凝聚力、归属感增强的基础上，大家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得到提升，对村内思想道德建设、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公共文化建设、移风易俗活动推动等更加积极，使良好风气得以营造、乡风文明得以建设。

3.4 依托平台宣传乡村文化，调动村民自豪感积极性

形成良好的风气氛围后，更重要的是如何使其可持续地发展，如何调动村民的自豪感、积极性。对此，文化礼堂作为乡村文化的地标所具有的展示、宣传属性可做出回答。展示、宣传与一定的对象相关联，因此文化礼堂所承载的乡村文化应当“走出去”。经调研可知，大部分的文化礼堂采取乡村之间文化走亲、媒体报道的方式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宣传，使村民的自豪感、积极性被调动，乡村文化的知名度得到提升。然而，在互联网发展迅速的今天，这两种方式的影响力相对低，本村文化辐射范围不大。相应地，获取其他乡村的文化信息也并不容易，各村之间争相发展文化的积极性未完全调动。因此，乡村可借助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对文化礼堂及其文化内涵进行宣传，在宣传中提升村民的自豪感，在交流中调动村民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袁君刚,李佳琦.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20(03).

[2]刘建.嵌入式治理:乡村文化治理的运作机制及实践困境——基于Y县“十星级文明户”的案例分析[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0(03).

[3]陈野.文化治理功能的浙江样本浅析——以农村文化礼堂为例[J].观察与思考,2017(04).